

目 录

江泽民题写书名		(五)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91
张万年题词		(六) 民主党派坚持斗争	201
迟浩田题词		七、转入战略进攻	218
前言		(一) 三路大军挺进中原	220
一、争取和平建国	4	(二) 内线配合大举反攻	251
(一) 抗战胜利后的局势	6	(三) 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	263
(二) 重庆谈判	10	(四) 展开新的强大攻势	267
二、保卫胜利果实	26	八、土改、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	282
(一) 反击国民党军的军事进犯	28	(一) 土改运动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	284
(二) 国统区反内战运动的兴起	47	(二) 整党运动巩固了党的队伍	299
三、政治协商会议	60	(三) 新式整军使部队面貌一新	303
(一) 停战协定的签订	62	九、战略决战	314
(二) 政治协商会议上的争论	71	(一) 决战的序幕	316
(三) 为维护政协决议的斗争	80	(二) 辽沈战役	322
四、运筹帷幄 争夺东北	94	(三) 淮海战役	333
(一)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96	(四) 平津战役	344
(二) 四平、本溪保卫战	101	十、新中国的诞生	358
五、不畏强敌 武装自卫	110	(一) 粉碎国民党的“和谈”阴谋	360
(一) 打破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113	(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与工作重点转移	371
(二) 打退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138	(三) 渡江战役和国民党政府的覆灭	379
六、如火如荼的第二条战线	162	(四) 向全国大进军	392
(一) 腥风血雨的七月	164	(五)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399
(二) 反对国民党包办国大	167	(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5
(三) 抗议美军暴行	176	后记	415
(四) 加强对第二条战线的领导	184	主要参考书目	416



延安火炬（油画）·蔡亮 作



大事提要

1945年

8月11日 蒋介石连续发布命令，要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

8月13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

同日 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复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不准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的命令。

8月14日 苏联代表与蒋介石的代表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同日 蒋介石第一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同日 朱德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送去备忘录，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同样有权接受日、伪军队的投降，要求不要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

8月20日 蒋介石第二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8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方针。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

同日 蒋介石第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8月24日 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同意到重庆谈判。

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当日晚，毛泽东等7名政治局委员同刚从重庆飞回来的王若飞连夜磋商重庆谈判问题。

8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对他去重庆谈判问题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全党：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8月28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迎接下，乘飞机抵达重庆。

8月29日 国共谈判开始。

8月30日 毛泽东分别会晤宋庆龄、赫尔利。

一、争取和平建国

同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到重庆上清寺特园拜访民盟主席张澜。

9月2日 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同日 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举行宴会，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9月3日 中共代表主动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

9月4日 蒋介石自拟4条复案交给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同中共代表团谈判的依据。

9月6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拜访柳亚子。

同日 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宋庆龄举行的晚宴。宴会后访晤苏联大使彼得洛夫。

9月8日 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在渝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士。

同日 国民党代表根据蒋介石拟的4条复案，对中共的11项提要提出书面答复。然后，双方代表进行逐项商谈。

9月11日 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就促进国共团结交换意见。

9月14日 张澜亲自出面，约请国共双方代表到桂园商谈，听取国共谈判近况。

9月15日 毛泽东再度来到特园，同张澜进行商谈。

9月16日 毛泽东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霍华德·海曼等3名美国士兵。

9月19日 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提出：人民军队将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省区的根据地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集中。

9月中旬 毛泽东在桂园会见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等团体代表。

10月8日 张治中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举行晚会，欢送毛泽东。

10月10日 国共双方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0月11日 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和王若飞一起返回延安。

10月17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报告了重庆谈判情况。

（一）抗战胜利后的局势

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矛盾的解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中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新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是打败德、日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之一，成为战后军事强国之一，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东欧一些国家的人民，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高涨，使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日趋瓦解。不仅在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菲律宾等国，发生了空前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堤坝。这些斗争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形成了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为许多国家的独立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战前，世界上有6个帝国主义国家横行霸道。战后，德、意、日3个法西斯国家垮台，英、法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只有美国在战争期间打着“民主国家兵工厂”的旗号，大做军火生意，大发战争财，爬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据有关资料，从1940年到1945年，美国公司纳税后的利润高达1249.5亿美元，相当于战前6年利润总和的3.5倍。1939年到1944年，美国工业生产提高了1.2倍。出口贸易急剧增加，从1939年的31.9亿美元增加到1944年的153.4亿美元。在军事力量方面，美国的军费开支由1939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800亿美元以上。美国武装部队总人数，至1945年已增至1200万人；海军舰艇总吨位达380万吨，居资本主义世界之首。美国为了称霸世界，充当世界宪兵，到处纠集反动力量，组织反动国际联盟，支持各国反动派，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

在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中，欧洲是它重点要控制的地区，而苏联则是美国控制欧洲的主要障碍。因此，美国把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国是亚洲的重心，夺取了中国，就巩固了它在亚洲的地位，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

慶祝抗日勝利
中華民族解放
萬歲
毛澤東

毛泽东为抗战胜利题词。



延安各界人民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洲，以称霸于全世界。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是美国控制中国的一个工具，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则是美国所不能控制的。但是，美国统治集团看到，如果采取大规模的军事干涉，直接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就必然会遭到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以致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因此，它只能采取大规模军事干涉以外的手段来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加强国民党政府的实力，以便帮助国民党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建立起统治。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对华政策声明中指出：“美国及其他联合国家承认，目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为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又说：“美国深知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并相信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改革。因此，美国竭力主张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声明特别提到军队，说：“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的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广泛代议制政府一经设立，上述自治性军队及中国的一切武装部队，应有效地结合成为中国国民军。”

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政策。在这个政策之下，美国一方面支持蒋介石玩弄“和谈”，目的在于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诱骗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作官；另一方面积极扶植蒋介石，支持蒋介石垄断对日受降权利，准备内战，由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借以消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

杜鲁门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一语道破了当时美国政策的“天机”。他说：“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战



抗战胜利了，逃难的人们返回家乡。



经历了八年抗战，人民渴望和平与安宁。他们在拆毁碉堡，准备重建家园。



上海人民欢庆抗战胜利。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报告，提出“建设新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图为到达天津的美军。



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抢占抗日胜利果实。

后，苏联人民需要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为了维护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等会议中所得的利益，苏联同美国进行了斗争，但在许多问题上，却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以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在《雅尔塔协定》中，苏联应美国的要求，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二至三个月后出兵中国东北、朝鲜，打击日本军队。其交换条件是：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争结束时归交苏联，外蒙古独立，将中国的大连港辟为自由港，苏联租借旅顺为军事基地，中苏共同管理中长铁路。这些协议是美苏背着中国秘密达成的。美苏并私下决定由美国负责说服蒋介石，由苏联负责说服中国共产党。经过美国从中撮合，苏联代表与蒋介石的代表举行了多次谈判，双方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美蒋十分得意。蒋介石于8月16日通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说：“中苏条约指明：（1）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2）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势力；（3）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于9月10日致电美国国务院，兴奋地说：“由于俄国的保证，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地大受削弱。”苏联按照美苏之间的默契，劝说中国共产党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美苏之间又斗争又妥协的状况，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出现极为复杂的局面。

抗战的胜利，也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抗日战争中，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发展壮大。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万党员的全国性大党，抗日根据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120余万人，民兵220万人。国民党统治区内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力量大为增加，并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同时，中国共产党经过延安整风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抗战初期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清算，党的马列主义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党空前团结。中共七大明确提出，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党的任务就是领导人民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坚持独裁统治，尤其是在战争的中后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越来越丧失民心。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就立刻打算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坚持独裁、内战方针，企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其独裁统治。在日本要求投降的第二天，即8月11日，蒋介石连续发布命令，要国民党军队“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

推进，勿稍松懈”，占领解放区；命令伪军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切实维持地方治安”，阻止人民军队受降；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日、伪军的枪械。8月15日，蒋介石的发言人宣布：“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公敌”。这样，蒋介石就把同共产党的同盟关系，变成了敌对关系，为内战发出了信号。除了发布上述命令外，蒋介石还包庇重用日军侵华头目，请其帮助制定打内战的计划，充当国民党的军事顾问。蒋介石还大量收编伪军，改头换面，变成国民党的军队，从而形成了蒋、日、伪的大合流。为了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把抗战时在大后方的精锐部队，火速调往进攻解放区的前线，企图先打通津浦、平汉、平绥、同蒲4条铁路线，分割解放区，然后占领华北，抢占东北，进而在全国实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军事企图表明，抗日战争刚一胜利，内战的严重局面就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社会政治的改革，发展中国民族经济。针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反动政策，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明确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他还强调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为了保卫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8月13日，朱德总司令复电蒋介石，坚决拒绝蒋介石不准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的命令。同一天，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蒋介石的命令是在挑动内战。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送去备忘录，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同样有权接受日、伪军队的投降，要求不要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8月16日，朱德总司令向国民党提出了制止内战的6项主张。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继续向敌占区进攻，不理睬蒋介石8月11日的错误命



美国用飞机空运国民党军队去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八路军解放被日军占领的华北重镇张家口。



八路军解放烟台。

令，坚决地、理直气壮地收缴日、伪军的武装，接受日本的投降。从8月11日起，在半个月内，各解放区人民武装，收复了敌占中小城市59座和广大乡村，扩大了解放区。

（二）重庆谈判

鉴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当时也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同时，蒋介石的精锐军队在抗战期间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地区，发动内战还需要一段准备时间，因此，蒋介石装出一副和平姿态，在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就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则可以通过“和平谈判”，诱使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还可以争取时间准备内战。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完全洞悉，但为了尽可能争取和平，阻止或推迟内战的爆发，团结全国人民，决定同蒋介石进行谈判。毛泽东以雄伟的气魄，亲赴重庆谈判，国共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

在接到蒋介石的两封电报后，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就要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他着重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并指出：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党需要和平，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同时，他也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

毛泽东判断：在同蒋介石的谈判过程中，关于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蒋介石才能逼他让步，他总之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要求的。毛泽东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去重庆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接着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不少人对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安全表示担心。萧劲光回忆说：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



日军向八路军投降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乘飞机到太行解放区前与部分送行人员在延安合影。

“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会上，周恩来、陈云、朱德、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最后，毛泽东说：“我是否去重庆？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

就在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又向延安发来了第三封电报。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在战后新的历史时期，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主，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且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等6项紧急措施。

当日晚，毛泽东等7名政治局委员同刚从重庆飞回来的王若飞连夜进行磋商。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明确表示他要去重庆谈判并认为，“这样，我们还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还认为：“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人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有人担心，毛泽东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妨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就不结城下之盟。

为了把毛泽东亲赴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重大决策告知全党，使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和精神准备，中共中央于8月26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表示：我方准备给国民党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通知》还指出：“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前在延安机场与前来迎接的张治中、赫尔利合影。



毛泽东、周恩来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



毛泽东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时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毛泽东与到机场迎接的蒋介石代表周至柔握手。



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重庆等地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写给毛泽东的致敬信。

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全党：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8月28日，带着真诚的和平愿望，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重庆。8月的重庆，正是酷暑季节。为了欢迎毛泽东等人的到来，人们冒着炎热高温，从四面八方汇集九龙坡机场。欢迎的人群中，有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等；国民党方面有邵力子、雷震及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等。

毛泽东等下飞机后，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简短的书面谈话，表示：“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周恩来在机场向中外记者说：“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他当即散发了毛泽东书面讲话的油印稿，受到极大欢迎。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使整个山城沸腾了。重庆各界人士和广大市民群众都以为和平有望，竭诚欢迎。一时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许多人写信给《新华日报》，表示热爱和平、渴望民主和对毛泽东的爱戴尊敬之情。他们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的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成都47名学生8月28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听说你来了，我们没有法子压抑对你表示的敬意。”“为了我们国家的民主团结、和平建设，在你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奋斗到底。”

西南地区的舆论界，对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也寄予了很大希望。重庆《大公报》在8月29日发表了题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说：“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成都《华西晚报》同日也发表社评指出：毛泽东到重庆，“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

重庆《新蜀报》、重庆《新民报》、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昆明《云南日报》等，也纷纷发表社论、社评，表示期望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成功，避免失败，以实现和平、民主新局面。

8月2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来渝正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力求在和平、团结、民主的基础之上，合理地解决当前实际问题，而协力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热心与诚意。国内国外的法西斯残余一直挑拨离间、破坏中国团结的阴谋，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来渝而击破了。毛泽东同志的来渝，象征着中国民主潮流的空前高涨，象征着中国和平团结前途的胜利希望。”

毛泽东到重庆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蒋介石原先估计毛泽东不会来重庆，他不过是想“假戏真做”一番，欺世盗名，对谈判毫无准备。当他得知毛泽东等在8月28日中午已登上飞机时，才仓促召开秘密会议，商讨谈判对策。

重庆谈判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在此期间，毛泽东直接同蒋介石就两党关系重大问题进行过多次商谈。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8月29日至9月3日，国共双方代表就一般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因为国民党对会谈仓促应付，9月3日，中共代表主动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11项提要，交予国民党政府代表。其主要内容有：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承认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区；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命令各部队暂停原地待命；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等。

9月4日，蒋介石自拟了4条复案交给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作为他们和中共代表团谈判的依据。蒋介石的4条复案要旨是：中共军队之编组，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急欲参加，可予以考虑；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蒋介石拟的4条复案，对中共的11项提要提出书面答复。然后，双方代表进行逐项商谈。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招待会上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赫尔利、张群、蒋经国等人合影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住地之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村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晤谈空过的石凳、石桌



国共两党代表会谈地点之一：重庆中山四路德安里101号

蒋介石对这次谈判的方针是：准备在政治上作出一些关于开放民主自由的许诺，但一定要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名义下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因此，国民党方面对于中共代表提出的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项方案表示接受；但对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地位，却坚决不予承认。这些问题就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为了使谈判能够取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作过多次让步。比如，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举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委，或者各解放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的恢复；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下，中共愿将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按照与国民党政府军队1:6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并且可以把广东、浙江、苏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解放区的部队撤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但国民党方面执意不作任何松动，致使谈判拖延甚至陷于僵局。

国民党政府代表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一再要共产党“放弃地盘，交出其军队”，声称“一党的武力政权”与现代民主统一的国家不相容。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以有力的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它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且两党拥有武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必须正视现实。周恩来说：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权交与一党之政府？

在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在重庆广泛与各界人士、各民主党派进行接触，交换意见，磋商战后时局及建国大计，并宣传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以扩大和平民主统一战线。

毛泽东几次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同民主同盟建立了联合斗争的亲密关系。

8月30日下午3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到重庆上清寺特园拜访张澜。张澜对毛泽东重庆之行十分担心，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接着，他还向张澜详细解释了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的主要内容。张澜听了连声说：“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

毛泽东还向张澜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新貌、人民福利、生产、教育等情况。张澜对解放区的新天地赞叹不已，心驰神往，“归来

向人说，疑是武陵源”。

当晚，张澜出席了张治中在桂园为欢迎毛泽东举行的宴会。宴罢，毛泽东又抓紧时机，在桂园同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陈铭枢、王昆仑、章伯钧、张中府、王云五、傅斯年、冷遹等进行商谈。

9月2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特园举行宴会，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毛泽东一进特园，便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一句话，说得满园生色。在大客厅里，毛泽东又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他还反复强调了“和为贵”。宴会后，毛泽东题写了“光明在望”，作为留念。

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就促进国共团结交换意见。张澜等都表示尽力斡旋，争取改善国共关系，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

这时，阎锡山军队正在山西上党地区向解放区进攻。当周恩来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家时，张澜愤慨地说：“公开打电报请你们来谈判，又背地里发动战争，绝对不能容许国民党这么颠预！”于是，9月14日下午，张澜亲自出面，同张中府一起，约请国共双方代表张群、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来特园商谈，听取国共谈判近况。周恩来表示：中共方面是“苟能求全，不惜委屈”，已就原来所提11项建议的方案作了让步。张澜便质问张群、邵力子：“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贻笑于天下吗？蒋先生不感到难堪吗？”张群、邵力子当即解释他们正在进行实质性的商谈，对于向解放区进攻一事，推说是阎锡山的“个人行动”，他们不甚了了。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再度来到特园，同张澜进行商谈。毛泽东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近况，指出属于关键性的解放区的人民政权、人民军队问题，国民党却说“根本与国家政令军令之统一背道而驰”。实际上，国民党意在使谈判陷于停顿，借此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以运兵接收日伪武装为名，积极准备内战。张澜推心置腹地讲：“深知政权、军权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你们应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地。”张澜又提醒毛泽东，已经谈拢的问题，应当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事后不认账。毛泽东欣然采纳，当即考虑对策。张澜建议说：“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毛泽东又欣然采纳，当面赞扬张澜是“老成谋国”。张澜的公开信，随即分送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刊出。张澜的公开信对国民党借政令、军令统一为名取消解放区政权和人民



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省南充县人。清末秀才。1903年被选送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师范学习。后回家乡办学，任铜庆府中学堂监督。他教育学生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救国家，朱德等学生受他影响很大。1911年为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之一。1917年任四川省省长。1919年赞助四川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创办成都大学，自任校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多方掩护和营救共产党员。1938年7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加抗日民主运动。1939年11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继黄炎培之后任主席。1944年9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抗战胜利后，继续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同共产党亲密合作。



重庆谈判期间，各党派、团体发表的宣言、声明。



柳亚子（1886—1958）江苏青吴江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清末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发起人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积极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抗战时期，与宋庆龄等从事抗日民主活动。1945年10月，与谭平山等发起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中央常务理事。同年被增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和毛泽东是诗友，曾有诗词酬答。

军队的行径给予了有力指责。

10月1日，张澜得悉蒋介石以武力解除龙云在云南的权力，立刻派人通知周恩来，督促毛泽东早日返回延安，以免遭到暗算。

原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著名诗人柳亚子，一贯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极端不满，对中共的和平民主主张和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竭诚拥护。为了纪念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历史行动，柳亚子特意写了一首诗，赠给毛泽东。诗曰：

阔别羊城十九秋，
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堪格，
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
云雷青史始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
一笑昆仑顶上头。

9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到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拜访柳亚子。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词，毛泽东即将1936年2月所作的《沁园春·雪》书赠给他。

毛泽东这首词气势雄伟，脍炙人口。词曰：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后来在《新民报》副刊上披露，在重庆引起轰动，一时传为佳话。蒋介石对此极为恐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布置对它进行“围剿”。《中央日报》主笔兼副刊编辑王新命网罗一批御用文人，以唱和为名，大张挞伐。国民党无耻行径，遭到进步文化人批判和驳斥。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压迫吞并政策，他们对国民党也十分不满和失望。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王若飞先后邀请一些工商界代表人物进行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向他们宣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9月中旬，毛泽东在桂园会见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等团体代表，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统治下，中国民族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只有结束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经济压迫，建设一个民主团结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唯一正确道路。在现阶段，中共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关系的政策；对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看待。这使工商界人士进一步认识

到改革政治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并了解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大公报》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倾向于国民党政府，但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和迫害人民的一些卑劣做法，有时也有不同意见。因此，人们评价《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是“小骂大帮忙”。该报负责人王芸生等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武装是“实行割据”和“另起炉灶”。毛泽东予以耐心解释和诚恳的批评，指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从而使他们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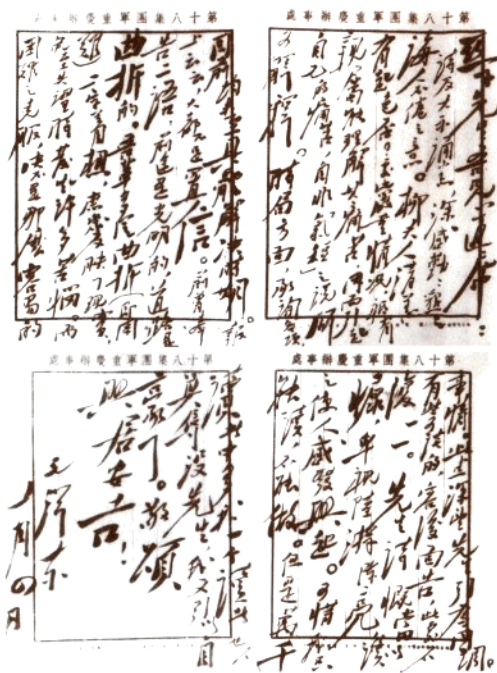
毛泽东还会见了中国妇女联谊会的代表，会见了宋庆龄。他热情赞扬宋庆龄忠诚信守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及其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不懈斗争的革命气节。

此外，毛泽东还分别会晤了国民党人士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立夫、戴季陶等。在会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时，毛泽东回忆往事，讲起大革命国共合作的情景，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的错误政策。他指出，十年内战共产党没有被消灭，反而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惨祸。这一教训难道不使人深省吗？毛泽东还谈到，中共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的“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毛泽东向陈立夫介绍了中共对国内时局的主张，要他认识人心的向背，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当然，陈立夫顽固的右派立场是不易改变的，他向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和“放弃一党的武力和政权”等。但陈立夫也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毛泽东同陈立夫的谈话，显示了毛泽东灵活的斗争艺术和争取实现既定政治目标的魄力。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还会晤了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美国大使赫尔利以及英、法、加拿大等国驻华使节，向他们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

9月8日下午4时，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在渝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到会的有保卫中国同盟的宋庆龄，英国大使薛穆及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敷，以及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代表。毛泽东在茶会上致词，感谢各方人士八年来对边区及解放区的援助，并希望继续得到这种帮助。宋庆龄、薛穆、艾德敷也相继致词，表示在今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建设方面，仍将继续予以帮助。

毛泽东在重庆还会见了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等3位美国士兵。这是



毛泽东给柳亚子复信的手迹。



毛泽东9月4日在美国大使赫尔利举行的欢迎会上与陈诚合影